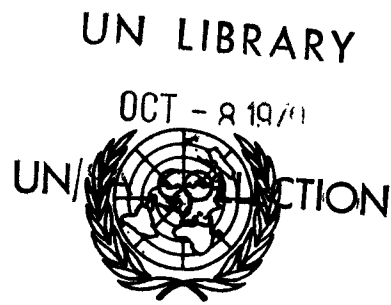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C.2/34/4
3 October 197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十四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
达德齐先生在第二委员会的发言 *

* 按照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分发。

79-25066

主席先生，

自大会通过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后已过去了十年。而自大会召开特别会议并发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后也已有五年了。明年大会将再举行特别会议，设法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给予新的推动力，其中包括通过八十年代和以后的新的国际发展战略。

由于这些理由，而且由于大会本届会议是在最近几个月举行若干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会议后召开的，因此大会本届会议自然是估计筹备一九八〇年特别会议工作的最近发展情况所产生影响的场合。有鉴于此，简单地回顾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特征、从历史观点来看它们、说明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需要的结构性改革与当前世界经济情况的关系，并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实行这些改革方面的相互利益，也许是有用的。

主席先生，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特征就是它要求作出结构上的改革；《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内已进一步地详细阐述了这项《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要点。这些文件的基本前提是，必须在世界经济中进行有系统的改革，使发展中国家除掉它们依赖发达国家的状态，因为这种依赖状态不仅是它们不发达的后果而且也是造成它们不发达的一个主要因素。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的是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广泛范围内作出基本的改革，因此国际经济制度才会比对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发展努力所起的作用更为公平、更加有效和更能支持。

为此，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除其他事项外，设法使全世界的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方式有深远的改变，其中包括大量增加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和工业产品贸易中的比重。它力求发展中国家能够对它们自然资源的利用实行充分和有效的控制，使它们在国际经济决策的过程中有真正的发言权，并使这些决策过程更加有效。此外，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试图改组国际经济和金融关系的结构，其中特别包括制定有关贸易、技术、货币和金融的国际交流的规则以及有关的体制、机构和决策过程。

实现这些目标的重点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自力更新，目的在使它们的经济互通有无、充分调动它们的资源、加强它们的能力以便制定共同的政策和采取联合行动来改善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一套原则和一套目标为基础的；这些原则和目标就是公平、主权平等、真正对称的相互依赖、共同利益和各国间，不论其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合作。因此，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着重于世界经济的质量改变，并谋求改变其工作方式。

从广泛的历史观点更能看出结构改变和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过去一个半世纪国际经济的扩大引起了世界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的革命。这种国际经济的扩大虽然深进，但是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内这种扩大都是不平衡的。

一方面，国际市场的日益扩大却回避了世界的大部分国家，这些国家因此而仍然固守它们的传统结构，以致简直没有可供投资或出口的剩余物资。当今几乎所有最不发达国家都同国际经济隔离，这并不是偶然的事。另一方面，由于各大都会中心地区内部经济动态的影响，国际经济的日益加深已使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健全、不均衡和充其量只是部分的发展而已。这些国家的经济就变成双重性，一部分进入国际市场，另一部分则仍实行古老的生产和分配方式。不发达国家进入国际系统后随着产生了高度的依赖性。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方式要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这种国际市场的特征就是讲价力的不平等；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部门也就受到外国经济利益的支配。这种趋势导致了国际分工，使发展中国家在这个系统中处于从属地位。

最后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的形式普遍使发展中国家丧失了本国固有的动力。同时，它们的政府也不能抵制这种趋势，因为殖民主义是常例，即正常的或是比较不明显的殖民主义形势。实际上，帝国主义的存在和不平等的发展往往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它们相互刺激和相互提供扩张和联合的工具。

随着几十年的过去，这种依赖的经济结构从国际经济的日益扩大和加深中获得充分的力量，不费力地消除了殖民统治的传统标志。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段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所反映出的无非是政治独立完全不是减轻经济依赖的充分条件，而发展中国家的单独行动只能在调整它们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取得有限的进展。

主席先生，政治独立和经济从属可能共存一时，但两者却不能和平或长期地共存。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冲突只能而且最终必须以一种方式来解决，那就是建立真正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所进行的结构改革必须消除两种制度的残余——殖民地制度的变形和传统或殖民地以前制度所固有的停滞状态。

国际经济的现状确实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而且它在战后时期已显示出可以有所增长和改革的巨大能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出现了专门化的新型态，发展中国家在教育、保健和工业方面都作出了不容否认的进展，新的技术已发生了作用，新的能源已被发现并加以利用，而且国际贸易和投资都表现出极为迅速的扩展。

尽管如此，制度的基本动态仍然一样，即使是在形式和外表上作出了一些改革。发展中国家虽然努力争取本国的增长资源以及使其生产多样化，但它们所采用的增长速度和增长形式却多半是由外部的因素决定。国际分工仍然不均，而且除了一些重要例外，经济权力仍然集中在北半球。原料的加工、运输和分配仍然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集团操纵。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出口尽管增长迅速，但主要只限于一些相当简单的产品。这些国家极易受到发达国家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并且主要依赖发展援助和其他的资金流动。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和技术转让以及运输方面的依赖性仍然很大，而且主要在北半球控制下的国际金融和货币制度显示其不能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作出适当反应。

这个遗留下来的问题只能通过结构改革来加以补救，其目的在于给予发展过程前所未有的大力支持，并对国际经济输入新的动力。从过去几年的迹象以及从短期到中期的展望来看，发达国家已进入持续的萧条和不单纯是周期性的通货膨胀时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作出深远的变革。仅求助于实行货币和金融的限制、降低消费水平、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或削减援助量可能为个别国家提供暂时的缓和，但必然会使整个制度中存在的根本不平等问题更形严重。幸好，发达世界已开始认识到采取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和生产能力的措施会极有助于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措施可促使全世界增加对发达国家生产资本货物工业呆滞

产出的需求。同样的，就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大家普遍认为，如能进行改组，充分发展其贸易和其他交换的重大潜力，这对所有国家集团都是有益的。

因此，促进现存关系和体制的改革具有明确的互利基础，这些改革如前面所述，会使国际制度的运用更为公平有效，而且对发展过程会提供较大的支持，同时还会促进世界经济的逐步增长。

工业部门尤其认识到，应该对专门化的型态作出深入的修改，包括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出口能力以及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部门作出补充性的结构改革。然而，这种认识实际上已被保护主义的相反政策否定，因为这种政策只是用来加强现存的不适当型态而已。从这个优势地位的观点来看，发达国家推行适当的工业调整政策可得的好处是无需加以强调的。发达国家可以大量地提高其生产力和生产投资水平，方法是：把生产的方式转移到由于其技术领先而具有比较利益的部门，而且增加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新产品数量。为此目的，它们将需要积极并予先制订调整政策，以便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工业的重新部署，并在第三世界建立新的生产能力和专门化作业。在国际分工方面作出的这种转变将为非通货膨胀的世界性经济增长奠立基础，因为这样的分工会带来高额的投资利润，并会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物价降低。这种转变也直接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因此也降低了劳工的实际费用并提高了实际工资。

此外，发达国家加速工业的重新部署和增加进口会由于对发展中国家贷款的增加而有助于它们自身的复元。发展中国家如能增加出口，它们就能在不会引起过多负债的情况下扩大借款，逐步提高其投资率，并且增加它们从发达国家的进口，从而减轻这些国家的失业问题。

在近期内，可以通过大量增加在官方主办下的资金转移，包括特别是官方发展援助和对国际收支平衡的援助，来加速扩展南北贸易。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持进口增长而愿意承担更多外债，已成为过去几年来发达国家出口的重要支柱，而且也因此缓和了发达国家的衰退势力。事实上，在这方面可以说明，正如过去

五年多来的事实所显示的，即使是非石油生产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市场也都比工业化国家可靠和富于活力。如果发展中国家按照工业化国家在一九七三年以后的做法，降低它们增长和进口来适应油价增涨的话，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衰退会严重得多。

期望发展中国家继续按不久前的速度累积债务是不切实际的。现在需要的是，明确承认反周期性和扩张性借贷的可能，和决心采取必要步骤以探讨这种可能；目前金融市场流动的资金过多，因此在金融市场可以找到资金而不至于给发达国家的预算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可是在这一领域里如果不采取行动，是否就会加剧经济的衰退，这一点又毫无把握。凡此种种全都表明了大家应当进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第五届会议通过的协商一致决议中所说的“大量的资沅转移”。

同样重要的是在同一时限内有必要执行贸发会议的综合商品方案，包括作为其主要因素的共同基金。为此而设立的用来调整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主要初级商品的世界市场的新体制构架，应可促进商品市场的稳定，从而减少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失调现象。对于作为综合方案的主要因素的共同基金，必须使其在这方面发挥催化作用，尤其是要使它有足够的资金去做到这一点。它不仅将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受到惠益，且将促进对新的生产能力的投资，并减少发达国家因商品价格的突然急剧上涨而受到的通货膨胀压力。整个综合方案将使世界商品经济逐步转变，促进生产国参与加工、运输和分配等领域的事业，其重要性已由贸发会议第五届会议予以强调了。共同基金的第二类业务旨在加强处于不利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商品部门，因此也应当可以起重大的作用。

在国际经济的改组过程中，免不了要发生如何逐步迈向比较可行的能沅使用方式的问题。新的和可再生的能沅以及新的石油资沅，对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来说，确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发展中国家特别迫切需要获得有保证的和日益增加的能沅供应，以维持它们的加速发展，同样的，它们也需要获得保证防止它们的国际收支情况因日益上涨的进口品费用而起了变动。工业化国家也十分关心石油供应

的充足和可靠问题。就石油输出国而言，它们也自然也很关心着如何在通货膨胀汇率波动和相对价格变动的情形下维持购买力的真正价值的问题，及如何保证获得国际上对它们的发展努力的支持的问题。此外，整个世界社会都同样关心国际货币和资本市场在能源部门所造成的收支差额的范畴内妥善进行业务的问题。

在这些情况下，尤其是在主要的能源消费国内，目前似乎只有采取严格的能源保护措施，包括采用更不浪费能源的技术，以及加速发展新的和可再生的能源，除此之外，实在别无其他办法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有必要作出巨大的投资努力，以获得所需的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的供应。在这方面，还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由此而进行的大幅度资金转移，将会增加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技术先进工业和高产工业的产品的实际需求。

粮食部门和整个农村发展的问题，也需要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强有力的、有远见的政策。各国需要采取新的主动，使世界谷物市场稳定下来，并充分和迅速地执行世界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会议的各项建议。此外，必须加速国内外投资资金的供应，以及发展中国家为了增加粮食生产和加强农事工业方面技术能力而需要的有形技术投入。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发达国家——必须紧抓下述的体制和社会问题：迅速转变通常按传统方针或作为外国拥有的种植园附属品而形成的糊口农业情况；和特别为了农村发展，把发展中世界里失业或就业不足的丰富人力资源用到生产性的用途上。早日就粮食商品或建立充足的储备的问题缔结协定，对达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所赞同的粮食安全目标，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主席先生，

我提到的那些经济领域或许是谈得最多的题目，但绝对不能代表重组国际经济的程序中所有的重点，这个程序必须包括南北经济交往的一切重大问题。但是，还有一点应当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间进行密切的经济和技术合作问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盛行“纵”的联系，而缺乏“横”的联系，这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标志着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不平衡现象。因此，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我们必须把加强集体自力更生作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同时也应视为达成新秩序的一个工具，因为这样才能增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从而有助于纠正不平衡的南北谈判力量。国际社会既然同意发展中国家间根据集体自力更生原则进行经济合作的概念为有效的、是有潜力促进增长和发展的，国际社会现在就必须以有效的物资援助来支持这方面的努力。这些努力必须包括加强发展中国家间在经济和其它交流方面的机构安排，扩大次区域范围以外的合作，商订政策使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生产能力、不同的发展状况发挥互补长短的作用，彼此更须给予优惠或特别照顾。发展中国家应特别保持并加强补偿办法，例如一组生产原料的发展中国家改善了谈判力量，但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蒙受重大损失。这种情况就须补偿。以各国同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关系而言，加强彼此的互助，这也一定有好处。比如可以汇集技术和经验，特别象能沉领域的技术经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当地能沉生产能力仍然十分薄弱，可以通过交换技术和投资资料，由发展中国家将需要处理的剩余资金直接转给其它发展中国家，作为生产的资金。

所有国家，不分经济和社会制度，都有责任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合作，发展中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间加强合作确实是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提供新的扩大的市场并且可以提供技术和设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选择机会，扩大它们的贸易和生产，减少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过分依赖。扩大这种关系对彼此都很有好处，当然，大家都理解，不管发展中国家微弱的谈判力量的历史背景，这种关系是以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原则为基础的，应当

能帮助达到目的。

主席先生，

正如秘书长最近在许多场合所说的，南北对话已经搁浅了。所得到的一点进展很有限，很零碎。许多方面的谈判不是失去了最初的目标就是把注意力从大胆改革转为部分调整。在大部分谈判桌上，许多工业化国家对具体提议所需的短期费用比对重组国际经济系统的长远利益还要关心。失望的情绪越来越大，联合国会议最近的若干决定体现有可能取得进展，这也只能使这种不满情绪稍稍平和，如果我们不能迅速把这种可能变成事实，就会有对抗和分裂的局面出现。

对话的程序和模式所造成的困难少，各国政府对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原则的政治决心所造成的困难多。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制定工作就是对这种决心的重要考验，这个战略必需要照顾到南北对话的所有问题，以及消除限制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适当政策。提出概念性质的复杂问题的目的就是要使所有国家政府担允执行政策措施，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并为全球的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因此，就可以把各式各样的具体谈判联系在一起，指出彼此的牵联关系，制订优先次序，订立衡量进度的标准。此外，假如新的国际发展战略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架构内制订并帮助达到新秩序的目的，那么就必须包括重组国际经济系统的行动指标，其中在明文规定的政策架构内商定包括能沉在内的原料、工业化、金钱和财务等项谈判的具体目的、指导方针和时间表。

此外，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审查和修正程序一旦确立，就能监测战略的执行情况，并能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修改或补充。当然，如要修订战略，必须先对发展的过程，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进展情况作全盘的了解。因此，在制订战略的时候，必须确保问题的处理办法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必须确保战略的执行是平均发展的，这包括要进一步举行的谈判，特别是同经济结构革新有关的谈判。

由于发展是全盘的，不可分割的，因此，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政策措施中还必须使发展中国家能充分调动国内资源，并同时能促进社会发展。因此，如果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谈判放在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范围内，就可以在下列二者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一、为改革国际经济关系而进行的共同努力；二、发展中国家为加速整体发展而作出的努力。这两种努力是实现迅速扎实的发展所不能少的。但是，这当然绝不表示，以上两个领域的政策决定，从业务上的意义来说，是互相对称的，或是互以对方的情况为条件的。

至于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处理能源问题，目前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现在大家都会认为可以列入南北对话范围。有一点看来是没有问题的，新的国际发展战略必需要对能源问题及其他问题的谈判订定方针和时间表，战略就必然会在这两类问题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此外，谈判本身必需考虑到能源问题同国际货币金融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第一，正如已经指出过的，从目前的能源使用形式过渡到一种比较站得住行得通的能源使用形式，需要准备大量的资金。此外，石油市场如何运转，对于所有国家集团的国际收支状况都有很大的影响。而通货膨胀率对石油市场的运行又有很重要的影响。同样的，石油剩余收入的处置方式，以及外国以什么形式向石油输出国开放投资机会，对所有类型的经济、对国际货币金融制度都有重要的影响。鉴于以上种种原因，假如要把能源问题和货币金融问题分别处理，那是不切实际的。在讨论能源问题时，还有其他一些有关的问题，例如在能源部门搞技术转让和发展地方潜力的问题、同能源及其衍生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问题、发展与能源有关的工业的问题。日后在讨论能源问题及其他

有关问题时必须把这些环节考虑在内。这种讨论会必须尽快组织。

总结以上所述，国际社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坚决有力地从事下面的工作：(一) 调动政治决心，迈向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将决心变为顾到各种问题的行动；(二) 发起讨论会，探讨能源及其他有关的大问题；(三) 着手制订一个全面的、强有力的新的国际发展战略，这个战略须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实现更迅速的发展和结构改革而进行的共同努力。

- - - - -